

時間、空間與記憶中的搜尋

一項安置本土政治學社群的討論提綱

陳 瑞 崇*

生活變得實在是太複雜了，假如一個人沒有一定的把握，他簡直不敢擅自挪動一步。因為在目前的情況下，只要他在走下人行道時先出左腳，他就足夠被稱做共黨份子……

查理·卓別林

用於表達過去的、古老的及泯滅中的感官，稱為記憶……想像與記憶是同一概念，只是基於不同的考慮所賦予的不同名稱。

湯瑪斯·霍布斯《利維坦》

如何為人類這動物創造一記憶？他如何把事物印在這部分遲鈍、部分輕浮的人類智性——這遺忘的化身上——以便使它付著？……一件事烙在記憶裡，使它停留在那裡；只有那些繼續傷害我們，才附著得住……每當人們認為有必要為自己創造一點記憶時，他的努力必然隨著苦楚、鮮血與犧牲。

尼采《道德系譜學》

並非有著任何特質、共同情境、或行為的共同模式，便意味著一個共同體關係存在。……人們可能發現他們是處於相似的情境，一種相對於外在環境使人們互相隔離的情境。但即使他們對這種情境皆有相同的反應，也不構成共同體的關係。光靠他們對這種情境及其結果有共同的“感覺”，共同體關係仍尚未存在，只有當這感覺導致彼此行為的相互指向時，一種社會關係方才在他們之間產生，而不僅僅是每個單獨個人對環境的關係。甚至只有當這樣的關係包含了相互隸屬的感覺時，才算是一種“共同體”的關係。

馬克斯·韋伯《經濟與社會》

* 本文作者係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專任講師。

甚至當我從事科學之類的活動，即從事一種我只是在很少情況下才能同別人直接交往的活動的時候，我也是社會的，因為我是作為人的。不僅我的活動所需的材料，甚至思想家用來進行活動的語言本身，都是作為社會的產品給予我的，而且我本身的存在就是社會的活動；因此，我從自身所做出的東西，是我從自身為社會做出的，並且意識到我自己是社會存在物。

卡爾·馬克思《1844年經濟哲學手稿》

從這個凝視起，就如它朝我而來，從一個虛像空間的狀態，亦即從鏡面之彼端，我因之回自我身；我再度地開始凝視我自己，並且在我所在之處重構自我。

米修·傅柯《不同的空間的正文與上下文（脈絡）》

1. 政治學社群的成員是否持有特定的行事規則，即在什麼樣的「位置」(location)同時從事政治學者及政治學系教師的行業？

「發問」本身同時是一項發言位置自我辨識與質疑，及審慎碰觸其他位置、建立世界觀的意志展現。發問的位置與意圖是在時間／空間／記憶格局及意識中，不斷地澄清與變動的過程及暫留的痕跡。發問的目的則是為了展露許多的部分的缺陷及其引發的不容忍與戰鬥目標。

這裡所稱的「行事規則」或「執業倫理」是指行動者對行動範圍、形式、過程（與其他行動者的力的關係）、目的及結果等行動構成元素間之特定關係、秉持一種默示的、允諾同意遵守的持續狀態。這組規則與行動者之間是處於一種相互參照與修改的關係，這項關係正是規則所以能對行動者產生規範力的源頭。因此，規則的產生是否透過民主程序及表現形式是否具文，和它對行動者活動的指引與規範作用之間，毫不相干。

它的表現形式如同政治社群中的「古憲法」(ancient constitution)，其源起已不可考，它不具有統一或單一的形式與力量，而是在群體生活各層面皆可感受到的、具多重面貌與多元力量的規律作用。社群成員唯有從群體生活中才得理解行事規則，並學習如何使用及傳承這組規則，當然包括對規則的懷疑、扭曲、批判或修改，有關規則的一切可能性，都將發生的群體生活中。

當社群成員發現他們很難自群體生活中得出行事規則，將使他們無法理

解自身所在的位置，甚至其存在及生活意識都不可或缺的社群生活脈絡，即他們雖置身於群體生活中，卻無法尋得其中活動的意義，是處於意義上的無政府狀態。個別成員的行動之間，失去相互辨識與評價的依據，群體生活就是處於在各說各話，自言自語，任意為之的虛無狀態。其間「沒有時間觀念；沒有藝術；沒有文學；沒有社交……人的生活是孤獨的、貧窮的、猥褻的、野蠻的及短命的……沒有適當或不適當的問題，沒有所謂的『支配』，也不分『我的』或『他的』；只要能得到它，它就是你的。」屆時社群、規則、制度及行動喪失了可供辨識的標記，及可供行動、詮釋與遵守的意義架構，是世界觀的消失。其間的成員不過是一群懸盪在時間、空間與記憶以外的浮游生物。

2. 如何自社群生活中探究政治學社群成員的行事規則？這首先牽涉到如何同時從描述面及批判面，辨識政治學社群的雙重社群區位——同時作為政治社群及學術社群的次社群，即先確定「我」正身處社群之中，再問該如何行事。

然而，這項問法至少產生一項困境：如何詮釋這些質問？發言及詮釋的位置是社群之中或外部？是否必須依靠其他更高位階或具超越性的規則，才得理解？如何得知位置所在？無止境地以這種問法追究下去，只是無限制尋求未知的「更高之因」，有助於解困？

筆者主張必須改變理解困境本身及其形成、解困措施與可能性的路徑。行事規則的產生、存在、變遷、消失或被取代及內涵等，不必依賴更（最）高位階的規則來解釋或證明，或根本與它無關。規則的作用及其範圍與效應，才是賦予規則以明顯位置的真正動力。當前者有所變動，後者很難固著不動。然變動的歷程本身即缺乏可控制或預期的方向，「起源」的探尋至多是一種費力又無助於趨進事實之變動歷程的策略與思考習慣。此外，尋求更高的單一因素或規則以作為解釋，勢必解消被解釋項接收或影響其他因素之作用力的可能性，並忽視現階段規則之形成作為多重力量作用的結果的複雜面貌，

「最高之因」至少只能發揮相當稀薄的解釋力，「起源」即失去支配解釋與理解事實的優勢地位。因此，無論就發生時間的先行或傳統思考格局中的最高位階，這種預設「源起」在解釋上的絕對重要性，對前述問題的回答顯然是無用的。

其次，「源起」的探尋如果有效，那麼必要將時間視為一條往不可違逆的單一方向進行的直線，而思考格局也如同金字塔的外形。它的源起看來就是位於最高點的單一石塊，以下的每塊石頭必須根據特定的、可以重覆的成套規則加以排列、堆砌，每一塊石頭的位置是固定的，其作用皆可按規則回溯出與塔頂及其他石塊的支配關係。同樣的思考格局，也反映在以憲法為最高位階的現代法律體系及其帶動的對「秩序」之構成的論述與行動。但若從構金字塔的實際過程來看，最高點的位置是最後一刻才出現的，也是藉由與以下位於不同位置每一石塊產生對照作用而決定的。因此，最高點是由位置較低的石塊所共同決定的，而不是源自處於最高點的那一塊石頭本身，甚至本身也無法解釋其他石塊的位置。此外，最高點可以隨著觀看的角度或被擺置的場景而有所更替。所以，代表最高點或起源的石塊是不固定的，但當最高點出現時，卻是只有一個，因為觀看的位置與對照點都變動了。真正值得討論的是「位置」，而佔據位置的客體顯屬次要，甚至是一種虛幻的高大，僅供標識而已。至於觀看位置的變動及引發的詮釋與效應，就要看觀看者的戰略與其目標。但是觀看者的位置與戰略是完全自選的嗎？

若從行事規則（金字塔石塊）的作用及其範圍與效應，其實是源於與其他規則之間是處於看似整齊但不規律的競逐鬥爭關係的角度來看，即諸多規則之間不是單純的支配／服從邏輯，也不是始終平等或和平的狀態，而是一種正規戰鬥、游擊戰與游牧並存的多重關係，戰鬥的結果除了在極少的情況外，往往是規則之間的相互滲透及資源上的明爭暗鬥。

因此，就本提綱關心的政治學社群成員的行事規則的形成與作用，不可能局限於該社群或由成員壟斷，必定與流通於政治社群及其他學術社群中的其他行事規則，進行接觸與競爭。當安置政治學社群及探尋其中的行事規則是必要時，討論的策略即不能局限於指向社群內部，而忽視同時存在的其他

群體生活規則的作用。

政治學社群同時作為政治社群及學術社群的「次」社群，也就不應當被理解為支配／服從邏輯的作用，而是諸多處於多角戰鬥位置的一員，即與政治社群及至少是人文社會科學社群同處於競爭的場域，各自的位置及變遷皆來自與其他單位的接觸。因此，次社群的「次」的意義可被理解為管轄區域的「較小」或構成份子的「較少」，而不是權力位階或戰鬥效能的「較低」。

3. 國家權力(state power)對政治學社群及其他學術社群之構成與成員之納入的強力牽引力，是區辨政治學社群之雙重區位的形成，並理解社群成員之行事的關鍵，即辨明構成政治學社群的政治經濟基礎，是發問的立足點。

教學與研究機構是辨識現代學術社群的標記，也就是說，如果沒有現代大學分科制度或專門研究機關，政治學社群是很難產生或無法辨識其發言位置。就戰後台灣而言，大學中的政治學系所及中研院的若干研究所（如社科所、民族所）的教師及研究人員，共同構成台灣的政治學社群。那麼，國家力量對本土政治學社群的構成是極為關鍵的。因為至少自台灣戰後以來，舉凡系所的設立、必修（戰）課程的安排、（課程及畢業）學分數及修習年級的規定、授課教師之聘任與升等資格等，皆由教育部統一規定辦理。在研究活動方面（至少就政治學研究而言），行政院國科會是國內最主要的研究經費補助單位，研究計畫的通過與否，往往影響大學教師作為「學者」的獨特表現及在社群中的「地位」與「成就」。因此，學術社群的構成及其間成員的活動與效果之評斷，即誰有資格作為社群成員、從事研究、升等，向來就不是也不可能獨立自主的，「學術自由」的解釋必須參照國家力量的運作而慎作解釋。學者所思索的是國家力量早就設定的場景，思索的路徑也與國家力量的作用契合，學術社群從來就不是讀書人腦海中，可以失去或抗拒重力的一大塊漂浮物。

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教育部或國科會對政治學社群的主要活動—教學

與研究，所以能維持有效的牽引作用的策略，不在於它所執行的是社群成員自發與共享的、對社群生活價值、制度及行動的共識，因為社群中根本缺乏促發或展露共識的制度性或其他非正式的安排。何況政治系所的設立與否，不在於其他社群成員的同意，而在於國家力量的許可與否。既使存在著真正的共識，也不妨礙國家力量的揮灑自如。

關鍵在於國家只需定期展現特定的個別政治社群成員（如系所主管）的判斷，藉著突顯發言者的權力地位，以宣稱該判斷的可推演性與代表性，加上國家力量作為執行上的強力憑藉，只要執行上的持續貫徹及不容異例的出現，那麼，社群成員在從事教學、申請研究經費補助、升等等重要社群活動時，所注意的將不是去得知、分辨或批判由國家所執行、社群成員背書的某一組判斷，而只是完美地服從它。政治學社群的既存建制及生態環境，其實是由國家力量所執行的、但不見得由社群成員共享卻必須由他們服從的判斷的結果。這是權力與知識互助合作、不斷衍生權力現象的現佳範例，也就是說，政治學社群的構成與成員的納入，都必須透過國家力量的核可，為了維持穩定的管理效果，國家在政治學社群中複製政治社群中關於權力的論述、制度與策略，建立前者成員對該項論述的效忠，並將這項效忠反射至對政治社群的認同。對政治學社群而言，當它面對國家力量時，如同面對一面鏡子，鏡子的絕對存在與其所反映的虛像，反成為它唯一所能理解的對象，是行事的唯一判準，行事正當與否全在於國家力量明示或默示的許可。政治學社群從此喪失觀照自身的意圖與能力，透過教學、研究及學術論述就是不斷地肯定與貫徹來自國家作為群體生活形式，及其宣稱必要之作為的正當與必然。這種失去戰鬥位置與發言能力的過程，正是台灣戰後政治學社群逐漸淪喪它應維持的獨特區位的歷程。

在辨識這項社群區位與現狀時，將連帶處理的是政治學社群與政治社群及其他學術社群（至少是人文社會科學社群）的交往關係。這組關係的釐清即可明白國家力量如何作用於學術社群的構成，無論是內部的或與其他社群的關係。

4. 對學術社群之構成與運作而言，國家力量之強大的、持續的牽引力，所加入的是主流的、有利於國家之獨佔權力行使的社會價值位階排列，其中包括對知識之社會效用的優先考慮、知識體系的有效分工、知識工作者與學識者的社會經濟角色、大學與社會的主客關係等看法。

知識、科系、教師、學生在這組價值位階排列中，各有其特定的、明顯的、必須得嵌入主流價值體系才得存在的位置，如同從平面進行空間切割，畫分面積的均等與位置的明顯對稱，才是分配的優先考慮，至於各個部分與整體之間，是一種「小」與「大」之間的可化約關係。這些位置及其關係，其實明白地表現所有關於學術社群之構成與運作的內外部規範。因此，政治學社群與政治社群及政治學社群與其他學術社群的關係，亦無法完全由學術成員自由決定，或僅從成員的行事上理解，必須顧慮同時所處之發言位置的多重力量的作用與結果。

政治社群先於政治學社群而存在。「政治」吸引人們的注意，進而思考「政治」，產生政治理論（論述），而後逐漸出現以生產與傳佈政治理論與專業的行業，最後乃出現政治學社群。政治理論是人類在具體情境中的意識反應，是人類認識及解脫自設之困局的途徑，是具備敏銳之歷史感及實際政治知識的思想人物的政治論述。這些體現人類生活歷史的論述，需仰賴政治學者的精煉與傳播。政治學者憑藉逐漸形式化的語言，成為這兩個社群交往的媒介與翻譯者，包括社群歷史及社群語言的相互滲透與詮釋。因此，政治學者共享了政治社群的歷史及其中所蘊含的行為規範的「政治秩序」概念。

這些共享的內涵是由政治學者與其他的政治社群成員共同創造出來的，當然無法被政治學者所壟斷。因此，流通於政治學社群中的（多元）典範及其個別論述，具有同時作為學術社群及政治社群之典範（或論述）的特性，不以操持該語言為專業的人，也可以公開自由地使用政治學典範。人類對「政治」的討論及行動，向來不因「政治學者」這項新興行業的出現與興盛而有所退卻。政治學者及所由構成的政治學社群不同於其他成員的是，透過

特定的形式化論述，按照政治社群的歷史所明示或暗示的解謎規則，從事特定謎題的解答活動。其他成員則選擇他們熟練的途徑，進行同樣的活動—詮釋及創造政治社群的歷史。政治理論吸引注意的地方，在於它真正地影響且構成政治社群的一部分，因為人們提出政治論述的意圖是深植於政治社群的生活歷史中，其思考的立足點是基於作為政治社群的成員，對政治秩序之建構、維繫與變遷的認識及評估。

由於同時身為政治學社群及政治社群的成員，政治學者在提出專業論述時，很難刻意區辨或控制所指稱的社群對象，使得論述勢必同時在兩個社群中產生意涵，政治理論的生產者與傳播者必定同時是學術工作者及政治行動者。既使基於專業論述之需要的聲稱，以自視正當的途徑，將論述所指稱的本就不局限於特定層面的對象，自層次交疊的脈絡中抽離出來，反而不利於分辨與標示政治社群，更容易模糊它在政治社群中的特定區位。政治學社群因此成為自成格局且封閉的活動場域，政治理論成為純粹社群成員的心智活動，不具重要的政治或社會意涵。這類宣稱忽視或無知於國家力量與主流社會價值位階的持續侵入，而試圖在學術社群內架設起夢想中的王國，揮舞著真理寶劍，享有無上權力，終究不過是著上國王的新衣。

然而，前述政治學社群與政治社群間原本界線的曖昧，正是國家力量極力操弄的對象，即不僅在二者之間，甚至在學術社群中也築起清楚可見且深刻的界線。國家只要發展出關於該界線之正當性的論述與制度，加以貫徹，即可握緊這項界線，達成管理學術社群的目的。否則讓這群以傳佈與應用知識的專業人員及他們的論述，任意進入政治社群，成為其中競爭使用權力的主角，對國家維持其特定意涵的政治秩序而言，十分不利。因此，國家雖不必禁止學術論述與制度，但必須將之納入有效的管理範圍。當前台灣各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科系的畫分，及課程安排與修課限制，正展現出當前社會對於與群體生活相關之知識及其社會效用的看法，且附加明確的位置與形象，是一種明確的、不重疊的空間配置，「分工專業」與「學以致用」是最典型的想法。當這項科系及其理由，並經國家力量的肯定與廣泛傳布後，政治學社群作為學術社群的次社群，其成員的論述似乎只能局限於屬該社群或其論述

專屬的對象—政治學中的「政治」，不等於就是人類群體生活中的「政治」。其他關於「歷史」、「經濟」、「社會」、「文學」、「哲學」、「人類」、「法律」等同時構成人類群體生活的行動範疇，似乎又屬於以這些範疇為名的科系，在教學、研究及相關公共論述的專利品。

儘管有「雙學位」及「輔系」的設計，但這終究是基於既存的知識分割但不交集之體系的權宜之計，彌補不了這種基於效率、強調分工但又壁壘分明的現代大學科系制度，所造成各類論述的片面、無力溝通與缺乏整體意識。這種分科制度不斷地應用在碩士班、博士班，訓練的結果就是持續生產出具專門知能的知識職工，負責的永遠只是裝配線上的固定部分，但到底身在線上的那個位置，或還有那些位置，負責那些部分，與眼前負責的部分有何關係，則不列入或根本無法考慮。

這種知識分工的概念、制度及所促成學術論述與人類群體生活之隔閡，及本身引起思考上的零碎，將進一步影響政治社群成員在時間與空間等生活範疇的認識與使用，與具體、獨特的群體生活的剝離及對抗，造成社群成員對社群歷史的無知與輕視，這是一種集體喪失記憶與應變行動能力的過程，因為「變遷」的意涵無從促發與被認識，試想一群缺乏時間及空間概念與記憶的人們，如何理解所身處的群體生活價值、制度與行動等的變遷，這其中當然包括政治學社群中的「政治學者」及「他們的」歷史。

5. 唯有共享一組謎題、解謎規則及解謎目的—精煉典範—的一群人，才能稱得上是共同體或社群(community)，這是基於對學科典範的信仰而展現出的團體信念(group commitments)。政治學社群的成員，所共享謎題、解謎規則及解謎目的是什麼？這些共享的基礎賦予政治學社群什麼樣的特質？如何從既存的政治學社群建制中，辨識、解釋、分析及重建社群成員的行事規則？

這必須從政治學者的社群活動來解答。學術社群成員的行為特質是透過形式化的論述表示見解，成員之間的關係就在論述本身及其引發的交往過程

中產生。這項關係的維繫或變遷的指標即在於彼此對執行之行業的目的、對象、方法及意義能否保持共識，這類共識的展現及認識則必須透過實際教學與研究活動的潛移默化。

雙重的社群意識——同時作為公民與政治學者——是構成政治學社群的關鍵因素，政治社群（現代形式的『國家』）是政治學者行動的意義源頭與立足點。政治學社群成員的行事規則是不斷地趨近、體現與傳布這項社群意識，也就是說，將雙重社群意識及其具體關係安置於教學、研究及各類學術論述中，使學生、教師及研究者獲取認識整體政治社群的歷史架構，以使社群中各次社群的獨特的自主地位，取得穩定的自由意義詮釋。這是一種預設規則的存在與必要，並默示地允諾同意遵守規則的情況下，發掘、認識、模倣、詮釋、質疑、批判、更替或摧毀規則的過程，相伴而生的將是對於發言位置及社群區位的不斷辨識、鞏固與浮動。因此，國家、政治學社群、行事規則及社群意識之間，不是由上而下的含攝關係，反而是彼此競逐的戰鬥行動與侵入，目的不在於取代或取消而是努力地保障其他單位，並掌握或改變它們之間在時間／空間格局中的位置與關係，在不預期流動方向的意義傳播中，達成重組（或更換）記憶的戰鬥目標。

政治學社群之雙重社群區位的辨識是建立社群意識的關鍵戰略，即先取得適當的戰鬥位置。社群區位的辨識與社群成員的行事規則之間，是一種互為構成的動態關係。成員的社群意識產生於對社群區位的認識與批判，同時牽動該社群與其他次群及政治社群的互為構成關係。當成員的社群意識變得薄弱或喪失，將使所屬社群之原有區位變得曖昧不明，及成員的行事將變得漫無所指，難以辨認，進而造成社群的消失。因此，從外部來看，社群意識的建立與維持，是社群區位的明顯指標；從內部來看，社群意識則是成員行事規則所以產生與運作的重要憑藉。

6. 確定政治學社群成員發言位置之後，如何從此理解其中的行事規則？關鍵在於發掘雙重的社群意識並將之安置於教學、研究及社群決策中。

政治學者的「雙重會籍」(dual membership)使得他們的行事目的，必須趨向於個人學術成就與雙重社群傳統的共容與共生，否則個人的作為將失去自適的意涵，一無是處，即以雙重社群意識作為個人與社群共存的媒介。如何主動建立、維持成員的社群意識？首先，必須自知發言的位置及其意義是屬於空間與時間的函數，因為群體生活中的「政治」是人類特定的時間與空間中，根據特定的記憶與判斷所從事的群體活動，政治學是在特定的時間與空間中進行的特定論述活動。這些活動包括教學與研究及相關制度，將關於這項身處特定但流動的區位的認識與批判，貫徹於研究、教學及社群決策上，是安置本土政治學社群的必要策略。因此，政治學從事教學、研究或參與社群決策時，必須注意其發言位置是由國家力量與學術社群的多重作用所牽引與安排的，是有其預期的特定功能的。但這不等於位置是固定的、發言內容是不變的、作用是可控制的，重點在於發言者是否／如何自知他的暫時位置，如何辨識諸多力量的作用範圍、形式及效應。至於他的發言內容與目的是否受到約制或擁有多少的自主，須視個案而定，但來自社群的牽制則是不可能避免的或否認的。但是不是以顛覆現狀、追求「合理秩序」或保持思想、行事態度上的虛無與權力行使上的任意為發言主旨，是發言者在自知發言位置的同時必須決定的發言方向。然而，真正弔詭的是，既使展現出明確的發言目的，其後果仍是難以預期的，那麼何苦要求發言者如此審慎與辛苦地辨識發言的位置與生態？如果發言者任意行事（如教學、研究），結果會有所不同？

當前政治學系到底是在什麼樣的時間／空間格局中，進行政治學的傳授與研究，即政治學社群成員發言的歷史？這項格局是如何構成與產生變遷？屬於國家力量與來自政治學者的份量各有多少？二者是合作、競爭、支配、對抗、顛覆或其他可能的混合關係？處於其中的執行者又是如何進行教學與

研究？這些活動與政治社群及學術社群的交往關係及結果？

後 記

在本提綱寫作期間，正逢今年諾貝爾獎各得獎人公布。今年醫學獎的頒發曾引發了一位美國華裔生化學家周 芷，是否應一起獲獎的爭議。周女士在答覆《民生報》記者詢問這項爭議時說，「到底誰是真正發現分離基因的重要人物，應由學術界人士去判斷，我並不適合自己下評論。只要原始資料留存，歷史會說明事實真相的。」（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七日，二十三版）

筆者認為，作為一位頂尖的科學家的這段話來看，周 芷至少透露了三項值得注意的訊息：（一）她相信學術界人士的判斷，是具有權威性的、是可以依賴的與期待。（二）她相信原始資料即行事紀錄會自行表述，呈現不容扭曲的真相。（三）她相信歷史一定會而且有能力說明真相。如果按照本文所提供的詮釋，「學術界人士」所指的顯然是承載、展現及執行生化科學社群傳統的科學家；「原始資料」是指實驗紀錄，是遵循特定行事規則（倫理）的活動過程；「歷史」至少是指生化科學的學科史。簡單地說，她相信透過學術傳統對她的活動記錄的權威評斷，會忠實地呈現在社群歷史中，她的貢獻自然可由當代及後代學者，從中學習、承傳與批判。這項對學術（社群）傳統的堅信，是科學家活動的意義源頭，是他們活動貢獻的憑藉與判準，其間個人研究與社群成就合而為一。台灣政治學社群成員的信仰是什麼？他們行事的目的與意義又是什麼？如果同時存在著多種意義根源，那麼其中有沒有來自社群的呢？以什麼方式為每一代的成員留下可供學習的前人行事記錄呢？如何教導他們解讀前人的活動是重要的？

參考書目

- Aristotle. 1988. The Politics. Edited by Stephen Evers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 Burgess, Glenn. 1992. The Politics of Ancient Constitution. Macmillan.
- Collini, Stefan, Donald Winch & John Burrow (ed.) 1983. That Noble Science of Politics. Cambridge Univ. Press.
- Connolly, William. 1984. "The Politics of Discourse." In Language and Politics, ed. Michael J. Shapiro, 139-67.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Dascal, Marcelo and Ora Gruengard (eds). 1989. "Introduction." In Knowledge and Politics, eds. Marcelo Dascal and Ora Gruengard, 1-31. London: Westview Press.
- Dryzek, John S. and Stephen T. Leonard. 1988. "History and Discipline in Political Scien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2: 1245-60.
- Feyerabend, Paul. 1978. Science in a Free Society. Taipei, Taiwan: Yeh-Yeh. 1990. Against Method. Revised Edition (Second Printing). New York: Verso.
- Foucault, Michel. 1972.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and 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_____. 1977a. Discipline and Punish.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_____. 1977b.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ed. Donald F. Bouchard. Basil Blackwell.
- _____. 1980b.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1: Introduc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_____. 1993. 「不同空間的正文與上下文（脈絡）」，陳志梧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頁三九九—四〇九。台北：明文書局。
- Galeotti, Anna Elisabetta. 1993. "Citizenship and Equality." Political Theory 21: 585-605.
- Giddens, Anthony. 1979.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Univ. of California

- Prss.
- _____. 1981.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 1 Power, Property and the State. The Macmillan Press.
- _____. 1985. A Contemporary Contr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 2 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 The Polity Press.
- Gunnell, John. 1993. "Relativism and the Return of the Repressed." Political Theory 21: 563-84.
- Machiavelli, Niccolo. 1970. The Discourse, ed. Bernard Crick. Penguin Books.
- Maclean, Ian, Alan Montefiore, and Peter Winch (eds). 1990. The Political Responsibility of Intellectuals. Cambridge Univ. Press.
- Oakeshott, Michael. 1962. Rationalism in Politics. New York: Methuen.
- Pred, Allan. 1993. 「結構歷程和地方—地方感和感覺結構的形成過程」，許坤榮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頁八一～一〇三。
- Rouse, Joseph. 1987. Knowledge and Power. Cornell Univ. Press.
- Walzer, Michael. 1983a. Spheres of Justice. New York: Basic Books.
- _____. 1983b. "Philosophy and Democracy." In What Should Poltical Theory Be Now? edited by John S. Nelson, 75-99. Albany, NY: SUNY Press.
- Weber, Max. 1993. 《社會學的基本概念》，顧忠華譯，台北：遠流。
- White, James B. 1984. When Words Lose Their Meaning: Constitution and Reconstitution of Language, Character, and Community. Univ. of Chicago Press.
- Wolin, Sheldon S. 1960. Politics and Vision.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 傅大為 1990 《知識與權力的空間》，台北：桂冠。
- 傅大為 1992 《異時空裡的知識追逐》，台北：東大圖書。
- 陳瑞崇 1993 「政治思想史『作為』什麼？——一項生態觀點的序言」，《東吳政治學報》，第二期，頁三一五—三五—。

A Pursuit of a Community within Time, Space and Memory

An Outline for the "Location" of Commun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in Taiwan

Jui-Chung Chen

Should the members of commun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obey specific ethical principles when they were conducting 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Did some kinds of ethical principle have ever existed and operated within community? Did these principles have any significant or realistic relevance with the curriculums in ou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What was exactly the enunciative location of the members when they fulfill their social functions?

This outline provides various potential perspectives and strategies to approach the questions above. First, my outline tried to point out an important fact that State power has a fundamental supremacy in an undeniable way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University in Taiwan. State also arranges the enunciative location for the members of academic community.

Second, we need not deduce the ethical principles of the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from some so-called "higher causes", such as freedom of academy, the autonomous status of University, but from the actual activities and struggles between teachers, students and the school authority. All these activities and struggles were the genuine power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the commun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How these activities and struggle did happen in the post-war Taiwan? How was possible to demonstrate the tensions between the dual dominant power-political and academic?

Third, the observations and critique of the ethical principles of the members should not ignore the main trend of social value system that has penetrated violently and legitimately the affairs of community. What were the social products of the academic activities and community for modern capitalist society? How did these opinions illustrate in the institutions and curriculums of the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The main purpose of my outline was to demonstrate the possibility and oblig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otential struggles and their strategies between University and State for the members of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The capability of problem-solving is the unique indicator of a "paradigm". We need not to involve the controversy whether there was a paradigm of political science for our community. However, we do need to defend and believe that there should be specific ethical principles or "constitution" in our community for self-interpretation and self-criticism of the members. Without such principles, no community and memory have ever existed.